

## 崩盘一刻

5月6日前股票被视若珍宝,危机中金融市场一直毫发未损。而仅用20分钟就动摇了这一概念。下午2点40分到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跌近1000点,创下道指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埃森哲咨询公司等知名个股短时交易价仅为几美分。股市稍后有所反弹,收盘时下跌348点,投资者依然困惑不解。

各方仍在调查,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场“闪电暴跌”。据说有位交易员在卖出宝洁股票时,把1600万股的指令敲错成160亿股,但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更有可能说明问题。对希腊救援方案和英国大选结果的担忧,股市前两天连续下跌,都使投资者担惊受怕。股指期货市场的大额赌注可能对此此次下跌负有责任。5月1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斯皮罗到国会作证时表示,暴跌原因依然不明。

与此同时,斯皮罗女士把注意力转向了股市的闪电速度。过去几年,股票交易日益使用新交易手段,这样更快捷、更便宜。200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中上市股票80%的交易额使用人工交易,到了2009年底就降低到25%。大量的工作都使用新的电子交易平台,比如Direct Edge和BATS,其交易时间都在毫秒之内。

管理并未迎头赶上。Direct Edge的总裁威廉·奥布莱恩说:“基本上他们在决定是否参与市场运作时,自由落体已经开始了。”纽约证交所试图放缓交易速度,决定关闭电子交易平台,通过场内的“专业人士”手工交易(这是美国唯一同时使用电子系统和“公开叫价”系统的交易所)。但其他交易所抵制这种减速行为。更有甚者,几年前采用了以下规定,禁止通过纽约证交所进行买卖盘传递,因为该证交所不能正常运作。这使市场失去了大量现金,当然加速了价格下跌。

另一个因素是“高频率”企业突然退却,他们的算法交易日益主导股市。平常他们在提供流动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不同于市场庄家,他们在股市震荡时没有义务这样做。管理机构认为,价格开始急剧涨跌时,有些高频率交易员会关闭程序,害怕他们的交易因为跌幅过大而被取消。从事高频交易的对冲基金Tradeworx公司总裁马诺·纳兰说,当他注意到价格出错时就会关闭程序,因为他知道交易所会取消这些交易。

监管机构如何预防股市下次突然崩盘?证券交易委员会建议,启动更严格、互相协调的市场“停盘机制”,该机制要求如果市场下跌到一定幅度,所有交易所将暂停或延缓交易数分钟。针对股市的“停盘机制”对特殊股票同样有效,也会制定成法律。

改革尚未结束。各方在努力弄清5月6日进行的数十亿交易,这给证券交易委员会4月份提出大宗交易员(每月交易至少2000万股或2亿美元)注册的建议提供了动力。这会使该机构更易于追踪未来的高频交易。和确定最低价格的“限价订单”相反,“市场订单”要求股票在价格最好时卖出,却没有有限最低价,如今受到各方责难。闪电暴跌仅持续了几分钟,其影响却会持续数年。

《经济学人》

## 一天法袍没穿也能当好大法官

5月11日,现任首席政府律师艾琳娜·卡根被奥巴马提名为大法官候选人,拟接替即将退休的约翰·保罗斯·斯蒂文斯大法官,如获参议院确认,她将成为美国第四位女性大法官。

与去年8月上任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一样,今年50岁的卡根,人生阅历也十分丰富。她在行政、司法、立法三大系统都工作过,还曾是哈佛法学院第一位女院长。然而,奥巴马宣布提名后,共和党人很快提出质疑:一个一天法袍都没穿过的人,怎能胜任大法官职位?

不过,没当过法官正是卡根的最大优势,也是她从大法官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美国是讲求多元化的国度,即便在只有9名成员的最高法院,亦有这方面的讲究。现任9位大法官中,已经有2位女性、6位罗马天主教徒、1位新教徒、2位犹太人、2位意大利裔人,非洲裔、西班牙裔各1人,充分体现了地域、宗教、种族、性别的多元。可9人却有一个共同背景:在出任大法官前,他们都曾是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这种所有大法官任前职业背景一致的情形,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这个“第一次”却遭遇了共和党、民主党的一致批评。他们认为,大法官审理的不止是法律问题,还包括堕胎、持枪、宗教表达、同性恋等关系普罗大众的文化争议,如果大法官少食人间烟火,空有司法经验,人们很难相信他能体会世间冷暖、民间疾苦。参议院前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斯·莱希甚至提出,如果总统只从法官中挑选大法官,最高法院很快将沦为“司法修道院”。

与奥巴马一样,前总统克林顿也是学法律出身。在他看来,最高法院如果全由只具法官经历的人组成,将极不正常。克林顿把对真实世界毫无体验的法官称作“脚注人”,认为他们只知死抠法律的细枝末节,很少顾及公众意愿。大法官仅仅会朝“正确的”方向投票是不够的,最理想的大法官,应当来自底层,既富同情心,又有人格魅力,能影响与感召他人支持自己的意见。

克林顿心目中的完美大法官形象,就是前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在出任大法官前,沃伦也没有法官经历,他出身贫寒,在基层做过13年检察官,又先后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司法总长与州长。沃伦进入最高法院后,运用高超的政治技艺,平衡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推动了司法发展。

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许多大法官反对解除种族隔离,是沃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个说服了他们,最终促成了一致判决。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克林顿当年一直想提名一位沃伦那样的“政治家”,调和最高法院日益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可惜机缘不巧,未能如愿。

即将离任的斯蒂文斯大法官,与沃伦的作用相似。虽然他不是首席大法官,却是自由派大法官的领袖,一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理念相近者,争取立场摇摆不定者。

奥巴马这次提名卡根,是延续了克林顿的思路,想让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相对务实、又体察民情的政治家出任大法官。更重要的是,作为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卡根拥有出色的协调能力与管理技巧。奥巴马用这位年轻女性接替斯蒂文斯,目的当然不是方便参议院批准那么简单,他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卡根充分施展能力与魅力,在最高法院争取更多支持者。

何帆(法律工作者)

## “茶党”是谁 “茶党”要什么?

美国草根保守派运动“茶党”领导人兰德·保罗18日晚战胜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支持的竞争对手,赢得国会中期选举肯塔基州共和党预选。

这场预选结果震动华盛顿政界,反对“大政府”的“茶党”快速崛起,可能改变今秋中期选举政治格局。民主党和共和党现任议员均感受到“茶党”的逼人声势。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个运动,包括它的诞生以及它的诉求。

### “茶党”是谁?

“茶党”之名起源于1773年点燃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与当初相似的是,今天的“茶党”也是由一群“愤怒的人”组成。他们从去年初开始,通过集会抗议发泄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很快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美国媒体很难为“茶党”下定义。它没有统一的党纲和组织,也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党”。

美国《时代周刊》追溯了“茶党”名称的由来:去年2月,美国CNBC电视台评论员里克·圣泰利在抨击奥巴马政府广受争议的房贷救助计划时称:“我们正考虑成立一个芝加哥茶党。”

六周后,也就是纳税日(美国纳税日为4月15日)前后,从旧金山到亚特兰大,有大约五十万人走上街头,举行了大中小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反对奥巴马的高税收、高支出和医保改革,并要求缩小政府规模。

如今,“茶党”由数百甚至上千个松散团体组成,他们在餐厅、起居室、图书馆、办公楼甚至网络上聚会。

由于“茶党”组织分散,要扩大运动的影响力,需要组织者花点心思。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茶党”运动组织者戴维·德杰罗拉莫说,去年他计划组织一次全州范围的行动,先四处联系所有他能找到的团体,邀请对方人员参加去年5月在阿什维尔举行的首届“北卡罗来纳自由大会”。当各方人员到齐后,德杰罗拉莫想尽办法说服这些团体加入“北卡罗来纳自由网站”。接下来,他在市政厅举行会议,拍下会议视频上传到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如今,德杰罗拉莫的团体每星期要发出6000多份电子邮件,不时举行非正式的抗议游行活动,并把活动视频上传到网上。

### “茶党”要什么?

尽管“茶党”的诉求形形色色,但某些理念在“茶党”运动中较为普遍,《时代周刊》总结了三条:

一是明确反对“进步主义”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一个由知识阶层组成的政府有能力为国计民生找到出路,而“茶党”认为,要解决问题,与其靠政府,不如靠个人,他们担心政府过多干预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形成所谓的“大政府”。

二是和历史上许多民粹主义运动一样,“茶党”运动往往成为阴谋集团和本土论者的集合。阿什维尔的“茶党大会”上,前科罗拉多州众议员汤姆·坦克雷多称,奥巴马之所以能当选总统,全靠那些不会讲英语的选民。这类有歧视非主流族裔之嫌的发言获得连连喝彩。在大会上,已故右翼作家克利昂·斯库森《5000年飞跃》是被演讲者援引最多的书,斯库森的很多观点带有极端色彩,至今争议不断,但在“茶党”中却总能找到支持者。

第三点则是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初民间政治运动的思想。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茶党人”苏珊·柯伦在最近一次公开场合演讲中说:“是我们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我们这些民众。我们是雇主,而这些被选举出来的议员是雇员。我们必须停止称呼他们为官员,不要再赋予他们更多应得的信任。”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电视辩论给西方带来什么

如果没有电视辩论,恐怕大多数英国人不会深入认识英国新政府的副首相克莱格。这位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在2010年的英国首相选举中,凭借电视辩论时的出色表现,一举名扬全国。2010年英国首相选举中,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三党领导人同台辩论,这是英国政治传播史上开天辟地第一遭。

### 电视辩论源自媒体革新

电视辩论是20世纪中期始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兴政治传播手段。

之所以新兴,其实也正是因为比起西方选举史来说,电视辩论的历史非常短。但是就在短短的50年时间里,电视辩论从美国扩展到德国、意大利、以色列,再扩展到拉美国家如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运用类似手段。

今天谈到电视辩论,无疑都会谈到1960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之间的那场辩论。这个时期,正是电视开始大规模登上传媒市场的时期。从电视上看,肯尼迪注意了电视传播的特点,在炙热的聚光灯下一身薄西服,年轻得体。而尼克松辩论前两周因为脚伤住了院,在聚光灯下又因为热而频频擦汗,给人的感觉是形象邋遢、上台紧张、表情疲惫。一场辩论下来,二人的执政形象一目了然,几乎是粉丝们将肯尼迪送进了白宫。

美国的选举制度培养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媒介顾问集团,每一位候选人都有一个庞大的形象设计班底,这些媒介顾问们为电视辩论的普及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的可能性。

当然,更重要的则是媒体技术的变化和革新。没有电视,选举辩论就不能直接走进千家万户。

### 电视是直接对抗的平台

很多政治人物直接参与到媒介活动中去,因为从政治传播学层面来看,直接沟通的信息损失最小,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保护也最大,当然也更有利于构建候选人的形象。

现代政治传播从1956年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电视的出现和电视辩论在政治传播活动中的使用。

在电视辩论这个对抗平台上,每个人的政策、风格、特色都能展示无遗。甚至在不少电视辩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业化的制作流程。时间、地点的选择,服装的颜色、款式,候选人每一个动作、表情和眼神都经过精心策划。

当然,电视辩论的兴盛,也与近年来西方政治传播学的高新技术倾向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很多政治人物直接参与到媒介活动中去,重视和公众的直接沟通。因为从政治传播学层面来看,直接沟通的信息损失最小,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保护也最大,当然也更有利于构建候选人的形象。

### 没经历过聚光灯是遗憾

电视辩论是西方世界现代政治传播的必然手段。一个没有经历过聚光灯的领导人,一个没有在聚光灯下经历检测和答辩的政策,总会多少给选民们带来一些遗憾。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的部分学者在对电视辩论研究之后,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电视辩论是否符合传统的民主理论。因为在欧洲传统的民主观念中,选民们一旦被赋予了选举的权利,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可以理性地作出判断。二是选民们能否在电视辩论过程中,获得有效的政策信息。

欧洲不少研究都显示,选民们只是通过电视辩论,强化他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并建立起更加牢固的选择基础。而电视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些非有效信息的传播平台。

比如一些人认为,女性选民在电视辩论中会关注哪位候选人长得更帅,哪位候选人的口齿伶俐、演说能力出众,而往往忽略其在政策方面的长项。

《新京报》